



为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张凌寒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日益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近年来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积极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同时,人工智能发展可能会带来前所未遇的风险挑战,需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依法执政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既能为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夯实制度基石,也能为应对技术风险、保障国家安全提供重要屏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在法治轨道上加强人工智能治理,构建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治理框架,已成为我国抢抓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性机遇的必然选择。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化,更好发挥法治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才能确保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以良法治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引发链式变革。一如历次科技革命催生治理体系变革一样,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应用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必然要求治理体系作出相应变革,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实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提升安全水平、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这决定了人工智能治理既要保障人类充分享受智能革命成果,又要确保其安全运行。

法治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可预期性等特点,起到维系生产关系、优化经济结构、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推进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化,应当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中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以良法治善治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增强我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人工智能“在基础理论、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还存在短板弱项。要正视差距、加倍努力,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完善人工智能监管体

制机制,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稳居世界第一梯队,但在基础理论、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还存在短板弱项。比如,在技术创新上落后于美国且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在产业发展上也存在差距。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4年)》中提到,美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数量位居全球第一,占比44%,位居第二的中国大模型数量占比为36%。同时,美国高度警惕我国的技术产业追赶,出台了大量封锁、制裁和惩罚性措施。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推进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化,要坚定促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目标,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

当前,人工智能已融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正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创新发展在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我们党所面临的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带来一定影响,成为事关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领域。推进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化,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安全发展的理念贯穿全过程各方面,在严守安全红线与底线、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充分识别和评估技术产业发展伴生的安全风险基础上,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在事前、事中和事后全周期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在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化过程中坚持适应性治理理念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迎来爆发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市场空间巨大,发展人工智能前景广阔,要加强政策支持和人才培养,努力开发更多安全可靠的优质产品。”加速迭代、爆发式发展,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这既决定了人工智能治理的对象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同时也要求在推动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化过程中必须坚持适应性治理理念,更好促进我国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适应性治理要求在高度不确定情形下作出决策,其要义是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治理策略,提高系统的适应能力,主要优势在于适用高度复杂社会生态系统。在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化过程中坚持适应性治理理念,就是要在法治稳定性与新兴技术治理灵活性之间保持平衡,在技术产业发展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的情况下,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全方位挑战。

围绕实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坚持适应性治理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化,更倾向于采用既有包容性又有激励性的灵活

监管。根据技术特性,关注可能的未来发展与功能变化,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充分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创造性。面对新技术无法完全适应传统法律框架的情况,给予一定的容错空间。比如,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蓬勃发展,但其生成的内容也可能出现数据不准、描述失真等事实性错误。在民事责任层面,如果要求其为失实信息承担严格侵权责任,则不符合当下技术发展水平;在行政监管层面,在新技术出现问题时可考虑予以暂缓运行而非禁止措施。可考虑设置人工智能应用“暂停运行”的启动和恢复制度,通过弹性方式避免限制技术发展应用。

坚持适应性治理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化,通过建立持续动态监管和事后恢复制度,将为技术进步预留发展空间并划定安全底线。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断催生新应用、新场景以及新风险,这些风险在人工智能设计和测试阶段可能无法被充分识别和评估,甚至可能超出人类经验与认知范畴。这要求我们正确处理杜绝风险发生与容纳技术发展未知前景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推动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化过程中,与设置传统实体性权利义务规范相比,应更加侧重创新优化过程性持续动态监管制度。此外,还应侧重从事前预防转移到最大限度减少损害发生的程度、持续时间并确保事后尽快恢复,如建立应急预案、损害发生后的备份系统以及在人工智能产品和系统中事前设置可以阻断技术的“开关”等。

建立和完善具有适应性的人工智能法律制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既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推动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化,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为科学指引,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应当充分认识到,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良法治对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促进和赋能作用。建立和完善具有适应性的人工智能法律制度体系,将为促进高质量发展与夯实高水平安全打牢制度基础。

及时响应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需求。通过立改废释多种方式解决现有制度不适应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发展的“时间差”“空白区”问题,从资源要素供给、责任合理划分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构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比如,高质量训练数据的供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突出瓶颈。在当前法律框架下,训练数据获取、利用的合

法性标准尚不够清晰,存在数据爬取的法律边界模糊、数据交易的法律效力存疑、个人信息数据流通的授权标准不清、版权作品的合法使用界限不明等问题,亟待以明确的制度规范为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必需的数据资源与行为指引。又如,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体的法律责任设置,既需要考虑到社会治理目标划定红线底线,又需要衡量现阶段技术的发展水平。在个案裁判中,还应考虑将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提供者的透明度义务履行情况、主动报告与补救情况等作为其法律责任认定的考量因素。

积极推进构建人工智能法律制度体系。人工智能发展将带来法律体系的全方位变革,其范围不仅局限于某一部或某几部专门法律的制定,而是涉及整个法律体系的适应性更新和完善。为此,一方面,要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发展的要素和领域统筹设计法律制度。重点关注人工智能相关的要素法,建立健全算力、数据、算法和模型的供给与安全等制度;又完善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法,对医疗、教育、金融、司法等代表性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作出规范。另一方面,要结合既有立法修法项目进程,在法律体系更新优化中充分考虑人工智能发展的因素。比如,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公路法等法律修改过程中,及时对辅助驾驶的合规要求与事故责任认定等予以制度回应;又如,在数字经济立法起草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促进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基础模型研发推广、人工智能产业化、传统产业智能化等相关制度设计。

科学安排高位阶综合性的人工智能法律制定进程。高位阶综合性法律历来是法律体系构建的重要标志。“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立法工作”等已列入相关立法计划,可借鉴民法典等的立法经验,基于适应性治理理念,通过灵活的形式载体,以小快灵立法、全面性立法至法典化立法的形式逐步迭代递进。其中,可先行以小快灵立法形式对人工智能治理原则、监管制度、分级分类、法律责任等基础制度和迫切问题予以初步回应,待技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法律关系更加稳定明确后,进一步适时统筹出台全面性立法。这既可提高法律制度的敏捷程度,也能够最大限度化解法律滞后与技术创新的矛盾。

当今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制定完善人工智能相关立法,抢抓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主导权。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化的成效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未来的走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化,构建完善人工智能法治体系,优化人工智能法律制度供给,不仅有利于实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也将促进我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

(原载5月16日《人民日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优良家风家教助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段美娟

好的家庭离不开好的家风家教。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好家风能带来好作风,推动形成好政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子女才能健康成长,社会才能健康发展。”“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优良家风家教是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涵养党员干部和公众的廉洁意识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在培育优良家风家教上下功夫。

从《孔子家语》到《颜氏家训》,再到《朱子家训》……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家风家教,倡导“家国一体”,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在优良家风家教的传承中,“公私分明”“戒贪拒腐”“见利思义”“尚俭抑奢”“爱国济民”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蕴含着清正廉洁的政风导向。比如,在宋、元、明三朝,浙江金浦江江的郑氏家族先后有100多人入朝为官,但无一入因腐败受到惩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家族具有优良的家风家教传统,流传下来的《郑氏规范》有168条之多。家训传承绵延不绝,美德传家历久弥新。这一典型案例启示我们,从一定意义上说,家风正则民风正,民风正则政风清。

注重家风家教,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立下“恋亲不

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掇腰”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制定了“十条家规”,告诫子孙做事的亲属“完全做一个普通人”。习仲勋同志一贯严谨治家,不仅在工作上实事求是、公正无私,在子女教育上也从不搞特殊化,不允许家人搞任何特权。他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老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将伟大理想自觉融入家风家教树之榜样。在我们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以红色家风为“传家宝”,熔铸成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良家风家教对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关,提出了“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的重大命题。

以优良家风家教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必须依托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关,提出了“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的重大命题。

以优良家风家教推进新时代廉

洁文化建设,需要家庭、社会、学校等各个方面共同努力。2021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中央纪委机关等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畅通家校社沟通渠道,鼓励学校与家庭合作”。湖南女子学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的重要论述精神,积极探索学校、家庭、社会“三联动”的家风家教建设途径。2022年以来,每年都在全校学生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安排以家风家教为主题的专题教学,向学生讲述家风家教有关廉洁清明的内容,同时策划以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为主题的图片展览、视频展播、主题班会、家风家训专题阅读,排演以家风为主题的《骄杨志歌》舞台剧等,在女大学生心中播下了清廉家风家教的种子,为培育未来的“贤内助”“廉内助”,筑牢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以优良家风家教涵养清明党风政风社风探索有效途径,取得了明显成效。

国无廉则不安,家无廉则不宁。发挥好优良家风家教价值导向、行为约束、净化环境的重要功能,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也是每个家庭的责任。只有以廉洁家风涵养时代新风,织密织牢家庭“护廉网”,才能真正以“小家”汇“大家”,让新时代廉洁文化蔚然成风。

(作者为湖南女子学院党委书记)

(原载5月9日《人民日报》)

抓作风建设贵在讲认真

李晓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改革发展事业,关键在党,关键在广大党员干部要有优良的工作作风。实践证明,抓作风建设最重要的是讲认真。”认真,是一种态度、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能力,只有将认真二字贯穿作风建设始终,才能真正实现作风的转变与提升。

在生活中,语言的模糊性有时是必要的。但放到工作中,如果含糊其辞成为习惯,就成了值得警惕的问题。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理论上可以”与“原则上不行”、“理论上可以”,有等一等、看一看的意思,不一定付诸行动,不保证最后结果;“原则上不行”,其实是留有空间、存有余地。这类含糊其辞的表达,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讲认真、不负责任的作风。理论上该做之事可能沦为纸上空话,原则执行中的弹性空间可能变为灰色空间,长此以往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规定就是规定,不加‘试行’两字,就是要表明一个坚决的态度,表明这个规定是刚性的”“办好一件事后再办第二件事,让大家感到我们是能办成事的,让是认真办事的。这样才能取信于民、取信于全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和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以钉钉子精神持续纠治“四风”,推动党风政风社风焕然一新。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之所以成为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靠的就是讲认真、动真格。当前,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在认真抓实、抓严上下功夫,就可以少一些“理论上可以”与“原则上不行”的虚风歪风,多一些干事创业的清风正气。

牢固树立“追求短实新、把话讲明白”的朴实文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就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文风也体现作风,改进作风必须改进文风。”实际工作中,有的热衷于“淡妆浓抹”,把本该通俗易懂的政策文件变得晦涩难懂,让人不知其意;有的充满“弦外之音”,过于宏观宽泛,不够精确,给后续执行留下“弹性空间”和“回旋余地”;有的“草草豆苗稀”,洋洋数千言找不出几条具体措施,让基层陷入“草中找苗”的尴尬;等等。

我国人才队伍和劳动力资源数量庞大、素质优良以人才资源优势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凌士显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社会生产力将不断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将稳步提高,改革开放将进一步全面深化,特别是教育科技事业快速发展,人才队伍和劳动力资源数量庞大、素质优良,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配套完善,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巨大,给民营经济发展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提供更大发展空间。”现在,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占有很重的分量,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备坚实基础。截至2024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5600万户,占企业总数量的92%;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42万户,占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92%以上;民营企业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的占比更是高达95%左右。4月30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将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平等对待、平等保护的要求落下来,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向社会表明了发展民营经济是党和国家一以贯之并将长期坚持的方针政策。

人才是第一资源。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关键。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战略深入实施,人口素质不断提升,人才队伍规模日益庞大。目前,我国14亿多人口中有近9亿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供给资源依然充沛;同时,2024年,我国供给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11.21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超过2.5亿,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毕业生规模全球领先,劳动者素质加速提升。庞大的人力资源规模和正在加速形成的人才红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人才支撑,也为民营经济创新发展、降本增效、文化塑造等提供了有力支撑。具体来看,一是能够推

凡此种种的“大概其”“差不多”,让人看不懂、难执行,问起来只能得到“理论上可以”的结果。在出台政策文件时,只有把话讲明白、有准谱,才能增强政策的可信度、执行力,保障改革举措落地生根、见到实效。

牢固树立“真抓实干、一干到底”的务实作风。作风建设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上,体现在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持续提升中。在这一过程中,讲认真尤为为重要。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往往十分具体且关系重大,大到关乎民生政策的落实,小到百姓生活中的点滴困扰,每一个问题都紧密关联着人民群众的生活福祉。我们在工作如果不讲认真,遇到困难绕道走,就难以洞察矛盾所在和群众的真实所需。只有秉持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深入基层一线,收集一手资料,运用科学分析方法,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政策;只有以高度认真的态度,紧盯改革任务,才能确保政策执行不打折扣、不变形走样,让改革发展红利真正惠及广大群众;只有始终保持认真钻研的精神,勇于突破思维定势,敢于尝试新方法、新模式,才能在改革发展中实现新突破、开辟新局面。

牢固树立“严守铁规矩、把住硬杠杠”的过硬作风。中央八项规定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其生命力在于执行,而执行的精度、效果取决于我们的认真程度。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将一盒茶叶、一顿宴请等视作“人情往来”,在思想防线上打开了缺口;个别单位在公务接待中,以“工作需要”为由突破标准,在办公用房整改时,通过“象征性腾退”等方式应付检查。这些都是对纪规规矩缺乏敬畏之心、不讲认真的表现,极易导致底线失守。党员干部要以不折不扣的认真劲儿,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中,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忽视任何一个漏洞,把好用权“方向盘”,系好廉洁“安全带”。同时,及时发现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决整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为,着力消除“原则上不行、私下里可行”的寻租空间和灰色地带,真正把铁规矩、硬杠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原载5月16日《人民日报》)